

东北

••

冯为群
吉林大

李春燕著
学出版社

沦陷时期文学新论

· I 206.6
东北沦陷时期文学新论

冯为群 李春燕 著

吉林大学出版社

东北沦陷时文集
冯为群 李春燕 著

责任编辑：李有清

封面设计：张沐沉

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长春市东中华路29号) 长春市东新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1991年7月第1版
印张：8.625 插页：1 1991年7月第1次印刷
字数：102千字 印数：1—600册

ISBN 7—5601—0909—8/I·42 定价：4.15元

目 录

历史的解读与审美取向.....	(1)
——序《东北沦陷时期文学新论》	
关于沦陷时期东北文学研究的思考.....	(12)
东北沦陷时期文学概观.....	(24)
日本对东北沦陷时期的文艺统治.....	(46)
谈东北抗联文学.....	(62)
东北沦陷时期的戏剧.....	(79)
东北沦陷时期戏剧的嬗变轨迹和艺术特点.....	(94)
东北沦陷时期文坛的几次论争.....	(106)
谈东北沦陷时期的文艺副刊.....	(119)
东北沦陷时期的文学社团和期刊.....	(130)
东北抗日文学的先驱者.....	(144)
——金剑啸和他的抗日文学	
山丁论.....	(165)
暗夜里燃烧的火花.....	(183)
——谈王秋萤在东北沦陷时期的小说创作	
一位给人以希望和力量的作家.....	(194)
——谈骆宾基的小说创作	
爱国抗日作家李季疯.....	(206)
关于古丁.....	(221)
一位饱经风霜的作家.....	(244)
——访女作家田琳	

谈冷歌和他的《船厂》	(250)
永远闪耀的星光.....	(258)
——悼念萧军同志	
悼果杳.....	(263)
后记.....	(268)

历史的解读与审美取向

——序《东北沦陷时期文学新论》

孙中田

人们对黑格尔这样的命题曾多所证引：“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恩格斯剥开它虚假的外壳说：“这显然是把现存的一切神圣化，是在哲学上替专制制度、替警察国家、替王室司法、替书报检查制度祝福。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是这样想的，他的臣民也是这样想的。但是，在黑格尔看来，凡是现存的决非无条件地也是现实的。在他看来，现实的属性仅仅属于那同时是必然的东西”。^①是的，在文学历史的解读中剥开“现存”的迷雾，寻求“合理”的必然的东西，该是多么艰难而有意义的事。这对于东北沦陷区的文学研究和清理来说，尤其显得切要。杂多的文化景观，被扭曲的现象，都曾取得了“现实”的外衣，可谓真伪杂糅，善恶浑呈，美丑不辨。然而它的合理性如何？能否成为必然性的东西，却自有依规。一个时期，人们曾为它的“故伪”疑团所却步，止于简单的可与否的价值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1页。

判断中，而难于去浊澄清，沙里淘金，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一大损失。然而，历史虽然沉默着，却是一个不变的常数，当解读者在一定的文化氛围中，形成真诚的对话态势，才会看取到它的合理属性。目前，对东北沦陷区文学的研究，正面临着这样的势头。实际上，这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拓宽领域，正本清源，深化自身框架的必然结果。因为台港文学，上海孤岛文学、东北沦陷区文学，无论怎样纷纭复杂，扭曲变形，终竟是它的组成部分。于是对于东北沦陷区文学的研究，不仅为东北地区的一些研究者所关注，同时，也成为整个现代文学研究界的话题，乃至在台港、海外，也多有研究者付出劳动。

这项工程的第一步便是披沙觅金，寻索庐山真面。诚如苏联院士依·波·巴甫洛夫所说，“事实对于学者就是空气，没有它，你就永远腾飞不起来”。真知，是卓识之母。一个研究者为史实所囿，不能在“现存”与“合理”之中，寻取固有的文理，自然难于索取到真价值，但是缺少史实的查证，没有文献学的基石，毕竟是空中楼阁。有时一则消息，一些数字，对于研究者都是宝贵的。例如说，日本侵略者为了在东北推行殖民文化，大肆查禁进步书刊，同时为了征服民心也用日伪的思想和文化取代。据统计1932年3月至7月共焚毁进步书籍650余万册；1935至1938年的四年间，禁止发行的报纸7440多份、杂志2310多份、普通读物3500多册；同时向东北输入的日本书刊：1936年为58.7万册，1937年增至380万册，1938年增至1000余万册，1939年增至1440余万册，1940年增加到2230余万册，1941年高达3440余万册（以上数字参看《伪满洲国史》有关章节），这数字本身就具有说服力量。近年来，我们读到了一批批的《东北现代文学研究史料》和

重新编选的作品集，都提供了有价值的史料。在此基础上编撰了《东北现代文学史》和一些专著，不断地把研究的局面拓展开来。就《东北沦陷时期文学新论》所见，有总体性的概观，有关于日伪对文艺的统治、东北沦陷区文坛的论争、文艺副刊、文学社团以及期刊的考察，也有一些作家作品的专论。照我看来，一切有生命力的精神劳动，都不在于哗众取宠，而贵于求实，在于真诚的与历史对话。

自然，人，作为历史的中间物，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是异常复杂的；而史实在一定情势中，不仅具有流变性，也常呈现出模糊状态。从心理学的镜角审视，人的性格，固然有其稳定恒常状态，但是仍然是一个杂糅的立体。歌德有时候是伟大的，但有时候也是渺小的，他有时候是反抗的、嘲笑的蔑视世界的天才，有时候是拘谨的、满足于一切的狭隘的小市民。^①黑格尔象歌德一样，在自己的领域里是真正的奥林帕斯山上的宙斯，然而恩格斯说，他仍然没有摆脱开德国市侩的习气。鲁迅认为陶渊明固然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一面，同时，也有“刑天舞于戚，猛志固常在”的“金钢怒目”式。在现代作家中，叛徒与隐士以及后来附逆的周作人，则同是一个人。对于在一定政治框架、文化统治夹缝中生活的沦陷区作家来说，更具有复杂的“文化性格”。就社会倾向说，肖军、肖红、金剑啸、李季疯、山丁等作家，大家是比较认同的。古丁如何呢？这个既受日伪“赏识”，又被严加监视；既以“写印主义”造成论争，又坚持要用“母语写作”；既是“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的重要成员，又要在创作中“缩短万民的距离”；把底层民众的苦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40页。

难，放在自己的艺术观照之下，就显得复杂得多了。真是正反杂糅，交相混现。这就为研究者提出更为烦难的命题，要付出勇气和真识，要摆脱是与非、敌与我的两极批评模式，去品评作为一切社会关系总和的人，品评作为历史中间物的人。看来，科学之途上，确实难于寻求到平坦而又笔直之路的。同时，作家的言与行，和他的作品一样，只能充作研究的材料，作为研究的客体而存在，研究者自当入乎其内，更当出乎其外，既要对象化，又要超越对象，从而保持研究者的独立品格。在这个过程中，见仁见智的事，会层出不穷的。人们说，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大抵状出纷繁的态势。基于解读者的社会倾向，文化素养，审美取向，道德信念等的差异，对于同一对象产生迥然而异的见解，是屡见不鲜的。莎士比亚创作的位置是有口皆碑的，马克思认为他的创作是世界艺术的顶峰之一。可是，偏偏是艺术大师的列·托尔斯泰认为莎剧是“很糟的粗制滥造之作”，这也是事实。对于沦陷区文学见解的抵牾，也许有助于事理的切磋，相反而又相成的道理，自然也适用于此。

二

毋庸置疑，沦陷区的文学，是血与火的结晶，是窒息下的呼嚎，是戴着镣铐的跳舞。因此，它的民族忧患意识，反抗的声音以及社会倾向正是它的价值所在。无视它的特征，将难于捉住它的“合理的”内核。

但是，它同时也是艺术。它是战斗的，也给人以愉悦和领悟。同属沦陷区的艺术，那品位并不相同。人们认为，作品的层次可以从社会的层面、历史的层面、心里的层面以至哲理的层面，逐步的深化下去。因此，在社会价值和审美价值的

互补中，寻取历史的美学的品评，也许会更为全般、允正。比方说，研究者注意到沦陷区文学对于忧患的人民生活的反映，肯定它的历史感和进步作用，同时，人们更希望解读在繁杂的社会生活与作品构建中的时代风情、文化氛围、人民的文化心态和作家的心态。实际上，生活与作品之间，并非是对应性的再现或表现，而是作家经验世界的重新组合与再造。在经验世界转化为艺术世界的过程中，意味着对现实的提纯与超越，因此，在作家对生活的观照与解释中，必然产生简化、延伸、变形等现象。从生活表象，到意象的生成，最后使作品造成物化形态，是主体与客体的双向契合的流程，由是，对于现实世界与艺术世界之间，深化研究就显得十分切要。例如，肖红的《生死场》，已多有论述。但大多就现实的表层意象，构成抗战主题说、农民在生死线上挣扎说、“怀乡”和“人道主义”说等等。但是，也有人认为抗战的题旨在作品中，并不占主要位置，作品在中国文化的多维结构中，显露出来的是延续千载的“畸形人生的诸方面的病态心理”，“是其沉埋于生命底层的‘本我’表现出来的一个扭曲的意象”^①《生死场》以新鲜、活脱而又近于残忍的跳跃式的画面，赋予它以一种潜在功能和更多的象征意义。因此认为作品是“写实”的，也是象征的。这解释未必完美，但是它脱开了社会的层面，向作品的深层面，向作品的深层游动，拓展了研究的空间。是的，当肖红建构《生死场》的艺术世界时，执著的透视力，已经越过了意象的写实表层，伸延到历史的和民众的心态的渊源中去，于是民俗社会中群体无意识的深层结构，被历史所扭曲的病态化进入到作品

① 皇甫晓涛：《一语难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0，3期。

中来，这时突破时空的范围，可以观照沦陷时期的近景，可以远视关东蛮荒大野骇人听闻的民情世态。社会的、历史的、心理的图谱糅合胶契，形成艺术的力度。这意象的构成是以经验世界为起点的，却以虚拟的再造性的组合构成象征的意蕴。于是那生生死死的“乱坟岗”、“私宰场”、“颓败的小庙、象地窑子一样的小屋”，带着原生态的气息，在貌似无序中显示出文本的生命精神，造成读不完的警句！那么作家的心态如何呢？例如说，像卡夫卡的《城堡》那样有多重指向（据说：第一是社会寓言；第二是精神分析寓言；第三是宗教的寓言，等等。）那到未必。但有几重因素是可以考察的。一是，作品的人物世界是浑纯的、麻木的、病态的，而作家的叙述格调所造成的情境是清醒的，和人物始终保有距离。对于他的人物是同情的，由此可以说，在总体上，作家虽然和她的人物一起经验生活磨难的，但是高于她的人物的；二是。这种“神话”的潜在结构的象征意蕴，不一定是完全清醒的建构的，但是，客观世界的民族文化潜流和作家作为历史之一部分的文化承载力，同样会在直觉思维中形成这种艺术境界。当然，艺术的深度取决于象征的深度，而象征的深度又取决于艺术家精神结构的深度，但是，按照弗洛依特的见解，“思想和欲望都可以是潜意识的”；三是，“抗战”的题旨，这应该是水道渠成之笔，作家是意识分明的。但从作家最初在《国际协报·国际公园》上发表的《麦场》之一、之二（这是作品的最初形态）来看，民众的文化心态，或者说被扭曲的病态社会心理的观照，显然是她审视的中心。总之，以肖红的《生死场》为例，深化对沦陷区文学的研究，应该是多有拓展的。

至于谈到象征，有人说象征是文学的专利，有人说文学

就是一个象征的世界。这自然可以从广义与狭义去理解。但是这对“戴着镣铐跳舞”的沦陷区文学来说，似乎是更为重要的一个特征。象征的意识模糊而且有很大的流动性，它给予创作以自由的空间，也时时造成形象胜于思想的暗示效应。在这方面就沦陷区的诗歌例举，这种审美取向，也是不难看取的。冷歌的《船厂·狐群》便是一例：

风雪漫荒郊／你们的空腹叫枵／踏荆抓住一只山兔／一气填鼓了你们的肚／在旷野里你们是患难的好友／依偎着顺着崖边走／蓦地里开始撕斗／因为谁多吃了一口肉／半空里响起了一声狼叫／一溜烟直着尾巴逃掉

诗中的意象世界是由动物群体的狐狼构成的。生存竞争，在动物进化中，应该说是常态；在人类社会中，却不能说没有这种相似性。然而，这已经是变态，是人性的扭曲了。诗人恰恰捉住了人与兽之间异质同构现象，构成了全诗的象征意蕴。而象征的模糊性与暗示性则成为全诗审美力度的弥合剂。首先，就狐狼的生存竞争来说，体现了客体的真实；就狐狼当道的人际关系来说，显示了主体的对象化，在主客体的模糊联结中，构成全诗的意境。其次，诗中的意象是一种自然形态，但是当它化丑为美，构成诗的意象时，显示出人际关系中的时代感和现实性，同时更以它象征的普泛性给予诗以更宽广的魅力。

当然，这是比较明显的例子。有些作品的象征意味就比较潜隐得多了，乃至你可以这样解读，也可以那样领悟。例如金音有这样一首小诗：

踏江南／芳草萋萋／踏五月烟景／白山在望也迷离／天又欲雨

这首诗可以作为一般的即景诗解读；也可以在固定的社会氛围中品味它的言外之长，弦外之音。这能量来自于意象的内蕴和涵蓄的力度。就意象的组合来说，江南五月，芳草萋萋，烟波美景，所展示的明媚春光，是引人入胜的诗境，加上远处的迷离山色，更加浓染了难化解的模糊意味；但是，突如其来“天又欲雨”，却使明媚与阴霾之间，造成悖反的逆差，这逆差，既趋实，又写意；既可以法乎自然，从而强化了诗的品味；又可以沿着写意的指向，把具象泛化，从而造成质态的形变，于是自然的“天”，转为化社会的“天”，这时整体诗便成为象征的图式。而明暗与的对峙，便转向时代、社会。诗的价值取向也从单一的审美尺度，成为社会的、审美的重合体。就解读效应来说，明媚与阴霾的反差，造成欣赏者的心灵受阻，即“心里压强”从而产生更高的期待视野，于是扭转现实的意欲便油然而生。当然，一首小诗，很难作为是观，不过，想到在夹缝中立意的沦陷区文学，也并非蛇足。看来，从审美的取向出发，对沦陷区文学进行历史的美学的品鉴，应该是多艰难而又有意味的事！

三

沦陷时期的东北文学，是在特定的地域、特定的精神气候下产生的。因此，必然的具有时代（历史）、地方特色和民族的精神。丹纳在他的《艺术哲学》中，就颇注意地域性与民族性，由此探求风格的变异。他不断地把时代精神与地域文化、民族风俗贯通起来加以论述。他说：我想做一个比较，使风俗和时代精神对美术的作用更明显。假定你们从南方向北方出发，可以发觉进到某一地带就有某种特殊的种植，特

殊的植物。”^① 鲁迅在致陈烟桥的信中也曾谈到：“有地方色彩，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② 在《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中，鲁迅也强调着“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难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茂草，高粱，蝈蝈，蚊子，搅成一团，鲜红的在读者眼前展开，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和活路”的特色。目前，地域文学的特性，已经被许多研究者注意到了，有人认为东北（或关东）文化的特征是“大汉雄风”或“慷慨豪侠”；有人认为它是“在浓重的中原文化熏陶下，实现了同当地土著的奇妙混合：稳健与冒险并存，重农与尚武同在，忠厚而不乏机智狡黠，野性夹杂着进取精神”。^③ 因此认为它与“荆楚”、“吴越”、“关中”、“岭南”文化、不能同日而语。这种研讨自然深化下去，有助于对沦陷时期文学的理解。

与此同时，也应该看到，东北沦陷时期的文学，不管怎样的割据封锁，它毕竟是整体中国现代文化（文学）的一部分。无论从历时和共时的关联来说，都难能割断它的气脉。丹纳认为“艺术家本身，连同它所产生的全部作品，也不是孤立的。有一个包括艺术家在内的总体，比艺术家更大，就是他所隶属的同时同地的艺术宗派或艺术家族”。^④ 研究沦陷区的文学，以整体流变的中国现代文学为参照，也许更见其丰富和多维关系。比方说，1937年前后，山丁提出的“乡土文艺”的主张和讨论，就颇能引发一些联想。真是无独有偶，早于东北沦为日寇统治下的台湾文学，不是在20年代便由赖

① 《艺术哲学》第8页

② 《鲁迅书传集》上卷528页

③ 参看王进：《地域文学的误区》，《文艺争鸣》1991.2期

④ 《艺术哲学》第5页

和等人提出了乡土文学的主张吗？同时，在此前后，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流中，也在鲁迅、周作人的倡导影响下，形成了乡土文学的流派。那么东北沦陷区的乡土文学与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母体，与台湾文学是什么关系呢？是影响承传抑平行发展？看来，东北沦陷区与台湾的乡土文学，颇有相似之处。东北沦陷区的“先从暴露乡土现实作起”、“暴露真实”等见解和台湾的“伤时忧国之士”，主张发扬“控诉”精神，重视对现实社会和人民苦难生活的反映，应该说是不谋而合的。而它们的“为人生”和为民众的意向与乡土风格，又与整个现代文学的母体构成血肉的关联。实际上“乡土”的母题，是传统文化的历时的纽带。只要读起“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的诗句；只要想起“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的意象；以及“万国尚防寇，故园今益何？”的吟诵，这种承传流变的文化意蕴和经久不衰的母题，便呈现在面前，祖国文化和地域文化的血脉便联结互补，造成“剪不断，理还乱”的思绪。所以，“乡土文学”即有时代的、地域的独特风情，又与祖国文化的母体息息相通。如果开拓视野，审理渊源，阐扬独特的风貌，也许是更有一番情趣在心头。

应该说，东北沦陷区的文学，不仅没有割断与中国现代文学母体的血脉，同时，保持着直接的联系。比方说，在现代作家中，瞿秋白、王统照、老舍、许玉诺、臧克家等，都曾在东北沦陷前后，来过东北，他们的文化影响，都是有据可寻的。瞿秋白的“蒙昧也人生！／霎时间浮光掠影。／晓凉凉露凝，／初日熹微已如病。”诗句就是在哈尔滨写就的。王统照《北国之春》则是东北生活的结晶。沦陷区的诗人冷歌与穆木天、许玉诺就有直接的师承关系，正是在他们

的启迪下，他走进了艺术的天地。而沦陷区的作家，冲破重重的禁锢和封锁，竟然刊发出纪念鲁迅的文章来。这看似孤立的史实，都会在历史的链条上活起来。

丰富和驳杂的历史，需要拂去风尘。“合理”的东西，必然成为“现实”。这些都将在深化的解说中得以完成。而今，冯为群、李春燕的结集，即将付梓。他们作了诸多切实的工作，有些史料是第一手的，诚可宝贵。至于见仁见智的去处，自有时间这位历史的老人来品评。

文稿即成。嘱我赘言，上边许多并不着边际的话，谨以代序。

1991年4月15日匆促成文

关于沦陷时期东北文学 研究的思考

东北沦陷时期的文学，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毕竟是历史的事实。尽管在沦陷的14年中“没有产生过光耀文史的金元杂剧和清朝一代的古典名作；也没出现过关汉卿、曹雪芹那样伟大的作家”（《东北沦陷时期文学概况》，载《东北现代文学史料》第4辑），但这一时期的文学却记载着我们中华民族反抗强暴的一段历史，标志着东北新文学在缓慢的发展中增添了反抗日本侵略的爱国主义的新内容。不过，由于每位研究者对这一时期文学的理解不同，所以在对东北沦陷时期文学的看法上，也就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和论争了。

下面，从文学发展的历史和文学研究工作的实际情况出发，谈谈我的一些看法。

要实事求是地对待东北沦陷时期的文学。

由于沦陷时期的东北文学是在一个阶级矛盾和民族斗争非常尖锐、复杂、激烈的历史条件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所以，它不能不反映出这一时代的生活和社会的某些特征；尤其是由于日伪残酷的文化统治，一些作家不敢直接或公开地把自己的反抗精神和爱国思想倾注笔端，所以，绝大多数作